寻石之路

一
二十世纪末，最后那个冬天。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、中亚之间。处处枪口，步步恐
怖，生命悬于一线。

那天晚上，在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边境，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。然后轻声告诉我，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
大学生，这两天发表文章，指控我在 “文革 ”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，叫石什么。

“石什么？ ”我追问。

“没听清，电话断了。 ”伙伴看我一眼，说， “胡诌吧，那个时候，怎么会有黑帮组织，何况是您 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。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。

二
终于活着回来了。

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，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。

但在国内，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。我也弄清楚了，他是说我在 “文革 ”中参加过一个叫 “石一歌 ”的写作组，没说是黑帮组织，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。

“石一歌？ ”

这我知道，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。

我在《四十年前》一文中写过，一九七一年十月，周恩来着手收拾 “文革 ”
的烂摊子，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，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。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、逝世三十五
周年，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，写鲁迅传记，研究鲁迅。于是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，一是
设在复旦大学的《鲁迅传》编写小组，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，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。我被抽去
参加过前一个小组，半途离开。 “石一歌 ”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。

我不清楚的是，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，有哪些人参加，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。

我更不清楚的是， “石一歌 ”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，而且堆到了我头上，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？

——

“ ”

“ ”

“ ”

第一个问题：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 “清查 ”
，那么请问，是谁指派他的？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？为什么指派他？他当时是什么职业？有工作单位吗？

第二个问题：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 “清查 ”，这个人怎么会把 “材料 ”
放在自己家里？他是档案馆馆长吗？是人事局局长吗？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，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
档案材料吗？

第三个问题：他如果藏有我的 “材料 ”，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 “材料 ”，那么， “别人 ”的范围有多大？他家里的 “ 档案室 ”有多大？

第四个问题：这些 “材料 ”
放在他家里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，应该有二十七年了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是谁管理的？是他一人，还是他家里人
也参加了管理？有保险箱吗？几个保险箱？钥匙由谁保管？

第五个问题：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，级别是正厅级，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
标准，恰恰是 “文革表现 ”，而且严之又严。他既然藏有 “清查 ”的 “材料 ”
，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？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 “包庇 ”、 “窝藏 ”之罪？

第六个问题：他提供的 “材料 ”，是原件，不是抄件？如果是原件，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？

第七个问题：如果是抄件，是笔抄，还是用了复写纸？有抄写者的名字吗？

第八个问题：这些 “材料 ”
现在在哪里？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，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，以及上海档案馆、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，
一起来看一眼吗？

第九个问题：如果这些 “材料 ”继续藏在他家里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，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？

… …

先问九个吧，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。

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：这里出现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 “历史问题 ”
，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。因为伪造文书、伪造档案、盗窃档案，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。

说 “伪造文书 ”、 “伪造档案 ”，好像很难听，但是社长，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？

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，但细看贵报，除了以 “爆料 ”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 “清查 ”外，还 “采访 ”了很多 “证人 ”来 “ 证明 ”我的 “历史 ”。但是这么多 “证人 ”
，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？熟悉我的人，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？这种事，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
上吧？

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，第一次伪造，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 “文革 ”
之后，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，只能用伪造来填补；第二次伪造，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
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；第三次伪造，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
我表演的时候。当然，如果贵报涉嫌参与，不会是第一、第二次。

□□□

六
写到这里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。

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，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，就怎么也甩不掉了。连悬赏也没有用，连地震也
震不掉！这，实在太古怪了。

有人说，为别人扣帽子，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。现在手多帽少，怎么可能摘掉？

但是，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：戴了那么久，还不知道 “石一歌 ”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。

终于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。

二○一○年仲夏的一天，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，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《名作欣赏》（总第
318期）。开始并不怎么在意，突然眼睛一亮。

一个署名 “祝勇 ”的人，在气愤地批判 “石一歌 ”几十年前的一次 “捏造 ”。

“捏造 ”什么呢？原来，一篇署名 “石一歌 ”
的文章说，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，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。

这个人断言， “石一歌 ”就是我，因此进行这番 “捏造 ”的人也是我。

不仅如此，这个人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 “捏造 ”
，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。那画，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。

任何人被诬陷为 “捏造 ”，都不会高兴，但我却大喜过望。

十几年的企盼，就想知道 “石一歌 ”
写过什么。此刻，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，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，是什
么样的了。

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，如获至宝。

被批判为 “捏造 ”
的文章，可能出现在一本叫《鲁迅的故事》的儿童读物里。在我印象中，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，由 “工农兵学员 ”
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，我当然不可能去读。但是，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
室，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，那可不是 “捏造 ”。

因为，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，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。

周建人会不会 “捏造 ”
？好像不会。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，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，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
交往。周建人又是老实人，不会乱说。何况，周建人在 “文革 ” 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。

本来，我这个人，是很难摆脱各种会议、应酬而轻松的，但是这个可爱的谣言救了我。当今官场当然知道这是谣言，却又会百般敬畏造谣者，怕他们在传媒上再次闹事而妨害社会稳定。这一来，官场就尽量躲着我。例如我辞职二十多年，从未见过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长，哪怕是在集体场合。其实，这对我是天大的好事，使我不必艰苦推拒，就可以从各种头衔、职务中脱身而出，拥有了几乎全部自由时间。这么多年来我种种成绩的取得，都与此有关。貌似弃我，实为惠我。国内噪声紧随，我就到国外讲述中华文化。正好，国际间并不在乎国内的什么头衔。总之，我摸 “石 ”过河，步步敞亮。

第二，这三个字，让我认知了环境。

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诸多人士，对于一项发生在身边又延续多年的重大诬陷，完全能够识破却不愿识破。可能是
世道不靖，他们也胆小了吧，同行的灾难就成了他们安全的印证，被逐的孤鹜就成了他们窗下的落霞。面对这
种情景，我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企盼，因全方位被逐而独立。独立的生态，独立的思维，独立的话语
，由至小而至大，因孤寂而宏观。到头来，反而要感激被逐，享受被逐。像一块遗弃之石，唱出了一首自己的
歌。这，难道不正是这三个字的本意吗？

第三，这三个字，使我愈加强健。

开始是因为厌烦这类诽谤，奉行 “不看报纸不上网，不碰官职不开会，不用手机不打听 ”的 “六不主义 ”
，但这么一来，失去了当代敏感渠道的我，立即与自然生态相亲，与古代巨人相融。我后来也从朋友那里听说
，曾经出现过一拨拨卷向我的浪潮，但由于我当时完全不知，居然纤毫无损。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一直身心
健康，神定气闲。这也就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：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，追随众人，而是逆反众人
，然后影响众人。 “大勇似怯 ”， “大慈无朋 ”。

由于以上三个原因，我认真考虑了很久，终于决定，把 “石一歌 ”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。

然后，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 “拾遗阁 ”，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 “诗亦歌 ”。或者，干脆都叫 “石一歌 ”，爽利响亮。

不管小茶馆还是咖啡馆，进门的墙上，都一定会张贴出各种报刊十几年来的诽谤文章，证明我为什么可以拥有
这个名号。

如果那一批在这个名号后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们来了，我会免费招待；如果他们要我把这个名号归还给
他们，我就让他们去找《南方周末》、《苹果日报》。但他们已经年迈，要去广州和香港都会很累，因此又会
劝他们，不必多此一举了。

我会端上热茶和咖啡，拍拍他们的肩，劝他们平静，喝下这四十年无以言表的滋味。

我也老了，居然还有闲心写几句。我想，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像那些退休老教授，听到各种鼓噪绝不作声。因此，可怜的是历史，常常把鼓噪写成了课本。

版本号 #1
由 admin 创建于 2026-11-05 12:56:04 UTC
由 admin 更新于 2026-11-05 12:56:04 UTC